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 龚仕建 张丹华 吴超



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兵谏亭、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区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听，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史的回响仍不绝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117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这里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园内二层阁楼已历经80多年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拱挑檐。小楼



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袂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

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会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

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评价的一句话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摘自2021年2月2日《人民日报》）



鲜红的八一军旗从诞生之日起，就为我军注入了灵魂和血脉，成为人民军队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鲜红旗帜，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新的革命道路。在这面旗帜的光辉指引下，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横空出世，汇聚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红色铁流。

八七会议后，已被国民党通缉的毛泽东自告奋勇，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究竟举什么旗帜？是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打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号？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初，毛泽东赶到江西萍乡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旗帜作了统一规定。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制作军旗的任务落在师部参谋何长工、参谋处处长陈树华和副官杨立三身上。

受领任务后，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军旗样式问题。同以往的旧军队不同，军旗要充分体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让工农大众翻身的新型革命军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何长工提出模仿苏联红军军旗的大概样式来设计军旗。经过一番讨论，三人最终确定了设计方案：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事业；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在旗左边白涵管上书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整面旗帜寓意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在军旗制作过程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军旗上的五角星由何长工利用折纸画图完成，他在

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

□ 高辉



法国留学期间曾学过几何知识；军旗白涵管上的字样，则出自书法水平较高的杨立三之手。

军旗样式确定后，师部决定立即批量赶制。在修水县城的一家祠堂里，师部找来几十名裁缝，通宵达旦地连续缝剪一个星期，终于赶在起义之前抢制出100面军旗。

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原定日期爆发。这天凌晨，在修水县城紫花墩举行的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正式飘扬起来。

如今，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被珍藏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静静地诉说着当年那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它生动昭示着，我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摘自2022年9月4日《解放军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的成立和发展

□ 钟同福

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8月由东村乡几名银匠办起的东村区（乡）造币厂。该厂于1930年5月由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并成立县苏维埃造币厂，厂址迁至东龙庵。10月，红军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工人增加到20多人，平均每天能造出银圆500余枚。

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造币厂的安全受到威胁，便由东村东龙庵迁移至宝坑村。正准备开工生产时，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造币厂又迁回东龙庵。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年冬，造币厂奉中央政府的指示，来到瑞金叶坪洋溪村，成立了中央造币厂，由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

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是手工制造，效率不高，操作程序也较为落后，但由于原料充足，铸币厂干部工人努力工作，产量不断增加。

1932年3月，红军在福建上杭县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并很快地运送到中央造币厂。中央造币厂的工人师傅将这台机器进行改装，并精心雕刻了钢模。此后不久，中央造币厂开始半机械化生产，先后铸造出在苏区流行的苏维埃银圆

（一元、五角等）和面值二角的银毫，一角、五角的铜毫，以及在白区流通的“鹰光”“帆船”“大头洋”“小头洋”“雕子边”“龙子边”等银圆，对打破敌人的禁运与封锁、改善根据地军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3年夏，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通过赣州商人从上海买回一台机器，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马金钢”。1933年冬，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设备，运回造币厂。1934年8月后，造币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厂有职工170余人。由于机器设备更新和人员增加，厂里实行三班制，日常产量稳步增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中央造币厂停止了造币生产，工人们组织成运输队，由国家政治保卫队1个连护送，将造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运输到于都县高陂龙山村。根据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指示，工人们在附近山区埋藏好机器设备，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参加游击战争。造币厂的几十担银坯，由国家政治保卫队护送，随中央政府办事处转移。

（摘自2023年2月23日《人民政协报》）

运城博物馆中的中华文明

□ 李建斌

从4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到“舜歌南风”“嫫祖养蚕”“禹凿龙门”等远古传说，再到华夏先民4600多年前对盐湖的开采利用史……来一趟运城博物馆，仿佛开启了一次感受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之旅。

“在运城，抓一把泥土都能挤出文明的乳汁！”这句让每一个运城人引以为傲的话，彰显了运城在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运城古称“河东”，如果把黄河比作母亲，运城就在母亲的臂弯里。相传，轩辕黄帝在此扫地为坛，尧、舜、禹曾在此建都兴业，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最早的中国”。在这片文化厚重的土地上，有4500万年前人类最早起源的“世纪曙猿”化石，有240万年前人类最早发明用火的西侯度遗址，有中国近代考古学开端的西阴遗址发

掘。运城目前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居全国地级市之首，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题公园”。

绛县棚国墓出土的荒帷、万荣县唐代薛徽墓中的石椁、芮城县东庄仰韶时期的彩陶盆、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的鼓风嘴……运城博物馆现有藏品35000多件，其中珍贵文物675件（套）。

此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距今约3500万年。“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把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通过放大镜，可以看到下颌骨及门牙、犬齿和白齿，犬齿相对较大，下颌角较圆，下巴前缘呈直立状，已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许多特征。

夏县西阴遗址是1926年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

最大成果是发现了有人工切割痕迹的半个蚕茧。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遗址周边发掘出距今6000多年的5枚石雕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蚕蛹形象。这说明早在6000多年前，河东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为研究中国丝绸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与黄帝元妃——嫫祖教民养蚕于夏县的古老传说相吻合。

“这个字读‘鹽’gǔ，《说文解字》里讲‘鹽，河东盐池也。’”在“鹽盐春秋”河东池盐文化的专题展区，参观者可通过视频了解到盐湖的形成过程。“这张图展示的是垦畦浇晒法，又称五步产盐法。这一产盐工艺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终成于隋末唐初，是先在长期劳作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乃至世界盐业生产史上的重大技术贡献，比欧洲晒盐法早了近1000年，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介绍，运城盐湖4600多年的开采历史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近年来，运城市不断加大“退盐还湖”“还湖于民”生态修复力度。展板上几幅新中国成立后和20世纪80年代盐化工生产老照片同如今的七彩盐湖照片形成了强烈反差，盐湖从矿区、工业区变成了生态保护区、旅游打卡地。

（摘自2023年5月19日《光明日报》）

